

牟平教育志

MU PING JIAO YU ZHI

牟平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MU PING JIAO YU ZHI BIAN ZUAN WEI YUAN HUI

牟平教育志

牟平教育志编纂委员会

牟平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及工作人员

第一届编纂委员会 (2000.9 ~ 2001.11)

主任 杨忠明

副主任 丛培福

委员 王忠诚 吕永波 刘艳杰 孙世良

编委办公室

主任 丛培福

副主任 王汝朝

第二届编纂委员会 (2001.11 ~ 2003.5)

主任 李健

副主任 王忠诚 吕永波

委员 杨世晓 孙世良 刘艳杰

编委办公室

主任 吕永波

副主任 王汝朝

编纂人员

主编 王树山

副主编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朝 曲培松 赵峻龄

第一届牟平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合影

(2000.9~2001.11)



左起：吕永波（区教委纪委书记） 丛培福（主任督学兼教委副主任）
杨忠明（教委主任） 王忠诚（教委副主任） 刘艳杰（教委
工会主席） 孙世良（副主任督学）

第二届牟平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合影

(2001.11~2002.12)



左起：孙世良（副局长） 杨世晓（副局长） 李健（局长） 王忠诚（副
局长） 吕永波（副局长） 刘艳杰（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

牟平教育志编纂人员合影



左起：赵峻龄 王汝朝 王树山 曲培松

1997年9月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副省长张瑞凤等领导视察大窑镇初级中学合影



前排：左二赵树国（区委书记） 左三李皆荣（副市长） 左四张瑞凤（副省长）
左五李培植（大窑初级中学校长） 左六朱开轩（国家教委主任） 左七
滕昭庆（省教委副主任） 左八林国深（副区长）
后排：左四高远良（市教委主任） 左七杨忠明（区教委主任）



车平一中南大门



车平区实验初级中学教学楼



车平一中学生在上微机课

车平区中小学秋季
田径运动会入场式



车平区实验初级中学
学生在上劳技课



车平区实验小学文艺演出



车平区第二实验小学
科技馆

全国成人中等专业教育

先进学校

国家教育委员会

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1995年度

省 级
文 明 单 位

中共山东省委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 东 省

学 前 教 育 先 进 区

山东省教育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山东省学校艺术教育

示 范 县

山东省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

全省中学教师“三沟通”培训

先 进 单 位

山东省教育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五月

山东省农村小学教学工作

先 进 单 位

山东省教育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四月

1996年度

文 明 机 关 单 位

中共烟台市委
烟台市人民政府

序

在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满怀信心健步迈入 21 世纪之际,有史以来第一部付梓印刷的《牟平教育志》问世了,这是值得祝贺的一件大事。

清代以前,牟平的教育,县(州)有学宫,村有私塾。清末,废科举,兴新学,牟平始有小学、中学、职业与社会教育,其中不乏捐资助学、倡导平民教育的仁人志士。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牟平的小学、初中等类教育又不断得到发展,为革命和建设事业输送了大批人才。

解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牟平历届党委和政府不断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 1978 年后,在国内外教育改革大潮的推动下,牟平以改善办学条件为突破口,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保证,以基础教育改革为重点,使教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校舍普遍进行了改建和扩建,校容校貌为之一新;内部设施臻于完备,教学条件不断优化;各种规章制度相继建立健全,学校和教学管理比较规范而科学;师训工作措施得力,教师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教育监督机制趋于完善,各级领导与广大教育工作者依法治教的观念基本确立起来;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协调有效发展;素质教育改革实验异彩纷呈,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和全国的前列;高中优生培养和创造学习工程开始启动,效果显著;高考本科上线人数万人比,自 1990 年始,连续 11 年列全市第一。

总之,牟平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牟平教育,由于重视了全面贯彻国家

的教育方针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等一系列指示精神,为提高牟平的人口素质、振兴牟平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认可,在牟平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牟平教育之所以取得上述成绩,究其原因,一是牟平实行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调动了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办学积极性,形成了“党以重教为先,政以重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的尊师重教良好氛围;二是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断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兢兢业业,奋力探索,甘为人梯;三是得益于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与大力支持。

为了记述牟平教育历史的发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昭示今人与后来者,牟平区教育委员会于 1999 年 9 月成立了教育志办公室,聘请几位老教育工作者纂修《牟平教育志》。

在此次修志过程中,编写者根据区教委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点,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合古统今,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五定篇目,十几次易稿,终成此志,洋洋 75 万言,其艰苦可鉴。

本志书记述了牟平学官、书院、社学、私塾和幼儿、小学、初中、高中、职业、成人、师范、普通高等和特殊等类教育的发展历程,涵盖了教育领导机构、教师队伍建设、教学研究、实验教学与电化教学、招生与自考、教育经费、勤工俭学、档案管

理、教育论著和教育人物等,内容广泛,资料翔实。志书真实地反映了牟平区(县)各级党委、政府切实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的思想,客观地表达了社会各界、海外赤子对科教兴国的热情,具体地体现了广大教育领导干部和教师高尚的爱岗敬业精神。博览此志,令人振奋;一卷在握,可资借鉴。愿广大教育工作者读后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以激励自己更好地发扬“蜡烛精神”,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奉献出毕生精力。

我们坚信,在新的世纪里,有党中央

“必须坚决地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英明决策的指引,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和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与锐意开拓,牟平教育一定会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

志书编纂期间,幸得全区各镇教工办、委直各单位、各级各类学校及许多老教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今借志书出版之际,特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忱。由于志书编纂时间仓促,编写人员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斧正。

杨忠明

序 二

〔按〕本序言对牟平教育自古至今的发展状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牟平教育的发展历程和成就,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叙述,并对发展过程中的高潮和低潮的成因,直言不讳地进行了剖析。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说,此序具有代“牟平教育发展综述”的作用。

本志书是一部统今合古的《牟平教育志》。其记述内容,主要是由牟平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学校教育。

牟平的学校教育,自古至今与我国同级、同类建置的学校教育发展轨迹是大致相同的,但也有某些地方特点。

我国的学校教育始于奴隶社会。史载,夏朝就有校、庠、序之类官学。甲骨文研究成果证明,那时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侧重德、行、艺、仪四方面的训练。西周时期,奴隶制社会的学校教育已基本形成系统,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内容。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的官学废弛,私学兴盛。汉王朝推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教育政策,以教安民,首创太学和郡国学,实行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制。之后,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沿袭着这种教育体制,无大变革。

应当肯定的是,我国的封建教育制度,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从教育制度、学校教育体系,到教育理论、教育原则与方法等许多方面,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对继承和保存中国古代文化,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封建社会的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的局限性,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后期,它严重地束缚了

人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牟平古代的学校教育形成于何时,其发展状况如何,因无地方文献可考,故难详述。不过,按常规而论,我国学校教育的种类、布局、规格,都与行政建置紧密相关。按有关历史资料推断,牟平的官学,最晚当始于汉初建东牟县时(具体时间不详),其县治就在今宁海镇原城内。汉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置东牟侯国,魏晋又置东牟县,唐、宋、金、元置牟平县,明、清置宁海州,其国治、县治、州治,亦多在东牟县故城。至于东牟县、东牟侯国和唐、宋、元官学的办学状况如何,因无史、志资料考证,不可妄言。然而,从置东牟县起,治所内有学校教育却是肯定无疑的。

明嘉靖年间(1522~1565),宁海州同知焦希程纂《宁海州志·学校》记载:“在城内东南隅,前先师庙,后学宫(即现牟平一中处)。设学正一人(教育行政长官),训导三人。”明成化四年(1468),知州姜连(琏)(1936年版《牟平县志》中有其传)创办东关、西关、南月城、朱堪、泽上5处社学(清朝中期渐废)。嘉靖丙午年(1546),

巡察海道副使李易在改建和扩建学宫时惊叹曰：“嘻！宁海之废学也久矣。”可见那时的官学办得并不正常——因有无战争、农业生产的丰歉和当地官员的重视与否而兴衰。清乾隆五年(1740)建书院(州衙东院)。这时宁海州仅有学官和书院各一处，就读者有廪生 30 人，增生 30 人，附生 18 人，武生 13 人——这是鼎盛时期的生员数。

与官学并存的是私塾。历代牟平域内有多少所私塾，入私塾者多时几人，少时几人，古代均无记载，近代也少有官员过问。但是，牟平的私塾，当早于官学，因战国时期，我国的私塾就很盛行。此时，牟平为齐国属地，而齐国又首推孔丘讲学之风，其属地办私塾早于他国是情理之中的事。

回顾近代、现代和当代牟平的教育史，大致经历了“三起三落”曲折的发展过程。所谓“三起”，就是三次发展高潮。

第一次高潮兴起在清光绪年间“维新运动”后，全国上下大办“新学”(也有叫它洋学堂的)。京都开办京师大学堂，广大农村则先后改建庙宇(这在封建社会里是大逆不道的)开办“小学堂”——这种“叛逆”性的变革，它不仅是对封建迷信的蔑视，也是对旧教育体制“大动作”的改革。

第二次高潮兴起在“五四运动”后，特别是解放后至 50 年代中期。其特点是大办基础教育(主要是小学和初中)。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主要是派遣教师、支付教师薪金)，百八十户甚至五六十户以上的农村，都竞相创办初级小学。凡是可以吃上饭的农家，宁肯节衣缩食，有的甚至讨吃要穿，也无不千方百计让子女读几年书。广大农民要求识字明理，而且认为家

中有读书人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耀。

第三次高潮兴起在“十年动乱”后。至 2000 年，牟平仅用 20 余年时间，幼儿入园率达 99.7%；义务教育(九年制)得以普及；普通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基本可以满足求学者要求和社会的需求；高等教育，虽然牟平尚无正规大专院校，但是，不同形式的高教，足以让有志者可以实现念大学的愿望。特别是一年一度的普通高考，2000 年本科录取人数万人比高达 21.2。

所谓“三落”，即三次低潮。头两次出现在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末期，第三次出现在“文革”时期。

第一次低潮出现在袁世凯窃国、复辟和因此而引起的此起彼伏的内战时期。“新学”一度呈现踏步不前状态。光绪三十四年(1908)，牟平发生“戊申毁学”之变。刚刚兴起的新学发展趋势遭受挫折；明令禁止的私塾开始“抬头”——按常规而论，私塾应在兴办新学之初就可绝迹。因为入学费用，私塾大大高于新学。可是，牟平境内的私塾，直至“新文化运动”在境内兴起时才逐渐绝迹(这与守旧的教育观念也有直接关系)。

第二次低潮出现在解放战争期间。因“一切服务于战争”，大批青壮年参军、支前和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造成了 1947 年初秋至 1948 年晚秋的“教育停办”(1947 年 10 月至 1948 年 2 月国民党第八军攻占牟平城及沿海部分村庄)。所幸这次低潮为时不长，在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至建国前夕，牟平的小学教育逐步恢复，而且有所发展。

第三次低潮——或谓“失误”(特指教育质量而言)，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但需要说明的是，50 年代末期的“大跃

进”，牟平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全国一样，不讲条件盲目发展，造成经费、校舍、师资的全面紧张，教学质量随之普遍降低。后来，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有所好转。可是，由于那时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是“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对上述“好转”视为“复辟”，“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不只是指向教育界，而是对文化、经济，甚至党、政、军全方位而论的，但教育界却是“首当其冲”），因此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特大的“失误”——在“造反有理”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什么“停课闹革命”、“革命大串联”、“开门办学”、“批判师道尊严”等一系列所谓“革命行动”及大量生产劳动，严重地冲击了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秩序，致使广大学生不仅没有学到应该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而且使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都受到严重不良影响。尤其使人忧虑的是，因“文革”和“左”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性循环。

为了借鉴历史，从而让我们的教育事业健康地发展，下文特就上述“三次高潮”的概况和成因作简要综述。

一、维新运动后出现的被封建统治守旧派称之为“异端”的新学发展高潮

维新运动后出现的教育事业发展的“高潮”，尽管在常见的近代史书中少有详细阐述，但是，不可否认，那是一场空前的大革命；教育事业大发展的客观事实应当予以肯定。而且需要正视的是，洋务运动对维新运动——尤其是对办“新学”的促进作用，如，从同治十二年（1872）至光绪元年（1875），每年国费派留美生30名。詹天佑等就是第一批留美生。但由于守旧

派的强烈反对，光绪七年（1880）留美学生全部凄然返国。维新运动时，光绪皇帝1898年夏在其改革诏令中明确规定：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派人出国留学，等等。现在的许多名牌大学就是这期间创办的——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宣统三年（1911），先后创办了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师范馆）、南京大学（初名三江师范学堂）、南开大学（初名南开学校）、复旦大学（初名复旦公学）、清华大学（初名清华学校）等许多高等学府。这一举措对地方上办新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京都和省府创办新学的影响下，地方上的开明官吏和乡绅们先后自发采取不同形式创办小学、初中和初级职业学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宁海州将书院改办为州立小学，同时利用清泉寺（即大寺）庙产创办“公立”自新小学；农村先后创办起武东、武西、三育、寿圣、云阳、维新、里仁、龙门、端本、龙泉汤、鹤止寨、泉水庵等十余处学校。民国二年（1913）将东关后土祠改建为东关小学。至民国四年（1915），全县共办初、高级小学400多处，其中有女子完全小学一处，被省政府评为县立模范小学4处。省道视学者推牟平为胶东办学之冠。

众所周知，清末民初，我国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深受帝国主义列强压榨。除此之外，牟平还受北洋军阀的盘剥，为什么教育事业能够快速发展呢？

简而言之，维新运动时，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条件。所谓“天时”，即国内“大形势”——应当肯定，维新运动不但是—

政治运动,而且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同时也是早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开明官僚、地方绅士和光绪皇帝都支持或倾向“维新”。有识之士无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迫切希望国家富强,从而改变被奴役的处境。正如康有为在奏书中所说:“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为强,守旧而亡……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并明确指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是教育不良,学术落后。”这就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们的共同心声。

论及“地利”,由于洋务运动后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兴起,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因此,某些地区的生产力有所解放,有所发展。当时的宁海州还是比较太平的,没有战乱;农村自然经济尚未遭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摧残;在风调雨顺的岁月里,一般农户可以勉强维持温饱,因此,许多村庄具有创办小学的物质条件。

维新运动时,广大农民的反帝风暴还在酝酿之中,没有爆发起来;也没有任何一个比维新派更进步的社会力量能够领导救亡运动。因此,“维新派”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革新派和人民群众的唯一代言人。特别是创办新学,它不仅是有识之士的强烈要求,也是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这就是“人和”。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教育事业当然会出现发展高潮。

此外,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在掠夺区内办起了一些教会学校,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服务于他们的侵略,但是其某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先进的,对我们兴办新学,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

二、五四运动后至建国初期出现的波澜性的教育发展高潮

五四运动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晶,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它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五四运动至50年代中期,我国的教育事业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牟平亦然。

这次发展高潮之所以称其为“波澜性”的,因为在20年代中期至建国初期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各自兴起过一次高潮。

第一次兴起在民国初期的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

这时期,牟平的初中教育从无到有。1925年,创办私立瑞泉中学(校址在今乳山市徐家乡瑞泉寺旧址),1926年创办私立紫山中学(校址在马格庄丰山寺——今院格庄丰山寺),1931年创办县立初级中学(俗称塔寺中学,校址在县城东南弥勒寺),1937年春,省立第六联合中学创办于县内青山(今属乳山)。小学教育发展更快,据1935年统计,牟平有县立完全小学10处,区立23处,村立34处,私立1处,未备案的11处。初级小学,县立的1处,区立的11处,村立的472处,私立的1处,未备案的214处;在校学生3万多人(上述数字含时为牟平县的今乳山市和莱山区数)。

其间,国民党牟平县党部中的左派,是支持广大民众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如推广乡校,举办自治,提倡剪发、放足等。国民党员宋竹庭、于俭斋、王福轩等,1932~1933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部山区举办农民夜校——教农民识字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第二次兴起在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

后至解放战争前夕。这期间,人民政府所办教育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1938年秋,日寇侵入牟平。牟平的教育遭受到日军肆无忌惮的摧残——1938年8月17日,塔寺中学被日机炸毁而停办;1938年9月15日和20日,日军两次火烧牟平城,把文庙、文昌阁、县立小学烧毁。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民族仇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牟平抗日救亡运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1941年,牟平除北部敌占区外,人民政权迅速建立起来,抗日民主教育事业(实际就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因为当时民族矛盾占居首位,所以提出抗日民主教育之说)也随之得以快速发展。

当时,抗日民主政府规定:凡有30名以上学生的村庄,设小学1处;每5~10个村庄办完小1处。据1943年统计,根据地(占全县行政区域的57.1%)创办小学的村庄为84.1%,办完小30余处,初小246处,在校学生19840人(此时牟平南部析为牟海行署——后改称牟海县,即今乳山市)。其间,抗日根据地业余教育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大小村庄都办起了农民教育——妇女识字班和农民夜校,学员们学识字,学唱歌,听时事报告。许多青年人希望能看懂“通知”,能写信,能读白话文、报纸和宣传品。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参加革命。因此,40年代初期有一大批无学历的青年人从政、参军,或当上了小学教师。

这期间,牟平县存在三种不同的教育:一是解放区的抗日民主教育;二是日寇占领区的奴化教育;三是杂牌军游击队统治区的国防教育。上述三种教育的争

夺是很激烈的。

1941年夏,胶东公学(我胶东行署办)由黄县迁至本县,在本县西南部的埠西头和原为牟平域地而划归牟海行署(今乳山市)的泽上、劳口、凤凰崖一带流动办学。1943年8月,我东海专署创办二牟联中(二牟,即牟东、牟西——牟平时分为牟东、牟西两县)。1943年春,胶东行署创办的胶东实验小学,由凤凰崖迁到埠西头,与原埠西头小学合并。该校为胶东抗日民主政府所办小学之最,为我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

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牟平全境迅速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进行了几千年来广大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欢天喜地,生产力得到大发展。这时的教育事业本应随之大发展,但却因“全面内战”导致1947年秋后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全部停办。

第三次兴起在建国后至“大跃进”之前。建国后,牟平的教育事业发展更快。1949年,全县在校学生32390人,入学率为79%。至1957年,在校学生达63368人,入学率为89%。小学校舍,1949年占地665亩,校舍建筑3325间,59850m²。至1957年,校舍占地996亩,校舍4983间,89694m²。

1945~1950年上半年,牟平县内无县办中学。1950年7月,东海中学师范部迁于牟平恤养院,内附设初中部3个班。1952年春,于圣人殿创办山东省牟平中学(今一中)。1956年于水道南山建牟平二中,于沐浴村建牟平三中,于酒馆村建牟平四中。1952年,初中在校学生301人,至1957年,在校学生达2439人。1956年,牟平一中始设高中两个班,在校学生

100人,1959年达4个班,200余人。

这次高潮本应持续发展,然而,由于国家大政决策连续“失误”,特别是“十年内乱”,造成教育事业形似发展、实为灾难的历史悲剧!

三、拨乱反正后迅速出现的基本上能够满足社会和经济建设需求的科教兴国的教育发展高潮

这次高潮出现在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之后。它的发展是迅速而踏实的,科学而规范的,注重实效、没有波澜,而且是很有“后劲”的。我们的教育事业有望出现更大的发展高潮。这次高潮,本区各学段均取得显著成就:

学前教育——幼儿入园率,由1978年的39%,提高到2000年的99.7%;农村幼儿园建园率和中心园建园率2000年均达100%,一类园标准以上园达80%以上。

小学教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1986年4月12日)前,我区(县)就基本普及——入学率为97.38%;2000年为99.8%。

初中教育——1986~1987年,原各乡镇由大队办联中先后改为乡镇办正规初级中学。学生在小学阶段学业结束后,可全部直接升入初中。1995年,我区顺利通过山东省九年制义务教育评估验收,被确定为“普九”达标单位(县)。

高中教育——1956~1958年,本县只有牟平一中招生,每年100名;1959~1965年,每年招生200名;1966~1967年未招生。1968年底开始办社办高中,计11处,1971年18处。1984年调整为县办高中7处。1995年又因行政区划变动而减少1

处。2001年1月,牟平四中并入牟平一中,本区高中这时调整为5处。这时初中毕业生就读于普通高中者达44.5%。

从恢复高考(1977)制度以来,我区(县)的高考成绩,是由初期的使人满意而发展到令人欣喜和振奋的。需要说明的是,废止高考制度后,高校连续四年未招生,尔后分配给牟平“推荐选拔”的大学生名额最多的1973年,仅为29名(另有中专名额97名,技工29名)。而恢复高考的1977年,牟平考入大本与大专56名,中专168名。1978年,考入大本与大专216名,“大中专”(高中毕业生考中专)254名,“小中专”(初中毕业生考中专)222名。1991年考入大本和大专计623名。2000年为1433名,其中大本1038名,大专395名。2001年高考报名人数2396名,录取大本生1255名,录取率为52%,比2000年增加217名,增长率为20.33%。从1990年至2001年,牟平区(县)连续12年高考本科上线万人比名列全市第一。

职业教育——从1980年牟平九中(王格庄)改办为农业技术中学以来,至2000年,牟平区(县)先后创办区教委(教育局)直属职业中专和职业高中学校4处;各乡镇(王格庄镇除外)也相继创办了职业高中。这些学校先后开设了20余种专业;至2000年,共培养中等专业合格人才16323人,为牟平的社会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2000年,全区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参加专科考试,录取率为87%。

高等教育——1986年8月烟台广播电视大学牟平分校建校,至1998年,先后办过8届普通高教大专班,总计招生265名,毕业261名。另外,还举办了不同科目的业余大专班。1984~2000年,大专与大本毕业生分别为778名和3名(含自学

高考)。为了提高全区教师的学历层次,从1987年开始,牟平县高师函授站先后举办了音像本科班和卫电专科班,现已毕业本科生187名,专科生1335名。

特殊教育——聋哑儿童入学率,90年代末达到98%;毕业生基本达到小学毕业文化水平;其劳动技术教育,达一级工和二级工水平的各占50%,基本实现了“残而不废、可以自食其力”的办学目标。

回顾这一高潮的形成,先后大致经历了有穿插交织现象的拨乱反正、改革→优化、法制→规范三个阶段。在叙述三个阶段的情况之前,似应首先说明:“拨乱”就是消除“文革”和“左”的错误导致之乱,“反正”就是恢复党和国家原来的政策和“规矩”。但是,原来的某些政策和“规矩”也存在“左”的错误和不甚完善之处,这就需要改革。改革是为了优化,然而,优化是无止境的,因此需要不断改革。“法制”是为了“规范”。大量史实说明,要避免“失误”,复兴中华,就必须实行法治,严于法制,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三个阶段的概况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拨乱反正

其突出特点是:

1. 摆正了教育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提出了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教育事业的大政方针

众所周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面对“文革”后“千疮百孔,百废待举”的局面,一代伟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领导我们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恢复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一系列切合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教育事业实际的大政方针,并亲自抓教育与科技工作。他多次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教育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基础和关键”;“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培养目标方面,他明确提出:“教育要培育‘四有’新人,造就又红又专人才”,“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并强调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教育体制方面,明文规定:“教育事业决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都要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应当支持教育,大力兴办教育事业”……

在邓小平同志教育思想的指引下,我区(县)进行了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呈现出“党以重教为先,政以重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的可喜局面。

2. 恢复高考(含中考)招生制度,教学工作纳入正常轨道

这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大举措,它取代了“文革”时期的没有竞争机制的“推荐选拔”制度。“文革”期间,高等院校被迫停止招生4年(1966~1969)。1970~1976年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即高中毕业后从事生产劳动两年的人员)。其间,“四人帮”又炮制了“白卷英雄”上大学的今古奇闻。这种招生办法,中断了学习的连续性,违背了教育发展的规律,扰乱了正常的招生标准,造成了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

恢复后的高考和中考制度,尽管并不十全十美,有待进一步完善,从而使其能够真正发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推行素质教育的指挥棒作用,但是,在当时它却顺

乎民意,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它为学子们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条件,排除了在选拔培养人才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对纠正学校工作中的混乱现象,就像抓住了牛鼻子——迅速“驯服”了那些已经闹野了心的“造反小将”们;这一制度,又像乐队的指挥棒,使整个教育工作有节奏地迅速进入正常轨道——各级各类学校都以教学工作为中心,因此,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3.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稳定师资队伍,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

“文革”前,在“左”的路线统治下,教师被定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文革”中,教师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称“臭老九”!学生可以随意揪斗、甚至殴打他们。可见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和人权低到何种程度!这使教师的自尊心和积极性受到严重伤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非常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教师,使教师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其主要措施有:①对优秀教师给予大张旗鼓的表扬和奖励。到2000年评出国家级先进教师19人,省级先进教师57人,市级先进教师327人。从1979年至1998年,全国有7000余名中小学教师被授予特级教师称号,其中牟平就有6名。②教师中的冤假错案,普遍给予平反昭雪。1958年在“反右”斗争中我县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141名教师,1979年全部得以“改正”。此后,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又进行了普遍而认真的检查。③因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而被拒之于党外的数百名教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④教师的工资大幅度增长,住房条件不断改善。1985年工资改革,我县公办教师平均月工资由1975年的42元增加到

77.1元;民办教师的劳动报酬由工分制改为工资制,月平均工资为56.3元(乡镇统筹)。1993年理顺工资,公办教师月工资由1992年的310元,增加到466元,民办教师增加到147元(不含各类补贴,下同)。2000年公办教师月平均工资增加到1002元,民办教师增加到322.5元。

1998年国务院关于教师住房面积规定:高级职务(次高)的可居住120m²,中级职务的90m²,初级职务的75m²。

上述措施明显地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有效地调动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一是使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纠正了“闭塞言路”的错误,恢复了畅所欲言的优良传统;二是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三是落实了政策的知识分子,心情舒畅,积极投身于四化建设和各项改革;四是扩大了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对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五是推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风尚的形成。提高知识分子物质待遇,对调动其工作积极性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总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英明之举,牟平教育事业这20余年的迅猛发展,是应当充分肯定此举的重要作用的。

4. 统一教材内容,明确了培养目标

“文革”期间,各级各类学校的原文化课教材基本被废弃了,代之以占主导地位的是“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以及乡土教材等。70年代初开始使用省编内容浅显的部分教材。面对教育的这一关键问题,邓小平同志1977年9月19日在《关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提出:“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而且他亲自挂